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发展研究系列丛书-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处在十字路口的 坦桑尼亚

—— 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

李小云 徐秀丽 王海民 武晋 / 著

Tanzania at the Crossroads: Historical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发展研究系列丛书—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

## —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

**Tanzania at the Crossroads**  
Historical Legacy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李小云 徐秀丽 王海民 武晋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 / 李小云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12-4929-9

I. ①处… II. ①李… III. ①坦桑尼亚—研究 IV. ①D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283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张 萱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  
Chuzai Shizilukou De Tansangniya: Lishiyichan Yu Dangdaifazhan

作 者

李小云 徐秀丽 王海民 武 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13印张

字 数

196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929-9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本书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RCID）出品的国际发展研究系列丛书——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之坦桑尼亚。从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研究传统来看，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一直是其关键性支柱之一，建构的是西方知识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体系、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其中，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区域的国家或文化群体都成为了国际发展援助“冒险乐园”中的核心关注地区，有关这些“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细节、治理体系、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传统自殖民时代开始就通过游记、影视、商业报告、学术论文、政策文本等被一一搜集、记载、整理、分类、分析、出版及传播等，从而构建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西方视野下有关“他者”的知识产业，而这个产业在中国来说，仍然非常陌生。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关注点较多地集中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这既有历史上天下中华，万族来朝从而导致闭关锁国等历史遗产的影响，也深受当代强调“自力更生”“埋头发展”等宏观政策倡导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稍有变化，但中国人之想象的异邦仍然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与国际接轨”“和世界靠近”等话语中所传递的是“国际”与“世界”相对于中国的外在化、绝对化和西方化。在此认知范式下，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考察投入不仅有限，且关注区域和研究主题上也较为狭窄。直到最近，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地不断迈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落实，以及取消大部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政策的推行等，不管是在宏观政策倡导上，还是在微观发展实践中，中国资本、人、商品、文化、符号等要素的外流趋势都在不断增强，这股潮流夹携着大量来自宏观政策制定与微观企业及个人等主体运行中的知识诉求催生了大量的有关异域知识开发与传播的活

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外部世界，尤其亚、非、拉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学科视角逐渐多元，其中，国际发展就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领域。

国际发展的话语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的海外殖民开发思潮与实践，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尤其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双边发展机制的设立后，国际发展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大为增强，延续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国际发展正日益成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与安全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际发展援助为载体，从概念、政策到手段，从规则、机构到人员，已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架构，这个架构在运行中越来越技术化和专业化，而在目标的设定上又越来越“去政治化”，逐渐趋于全球公共价值体系，如减贫，环境和气候变化等。但是，这套体系背后所隐含的理论框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基于现代化理论之上，西方国际发展实践固执地认为，要想获得有效的发展必须基于一个确保增长优化的制度变迁，也即只有发育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长期采用“发展干预主义”，并强调“软的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通过其对于“他者”知识体系所构建的“全球公共价值体系”使得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议程更具合法性。

然而，近年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发展架构正面临重大转型，这个转型反映出背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举例来说，2000—2012年间，中国援外资金协议金额从62亿元增至404亿元，这12年间的对外援助额占此前60年中国援外总额的三分之一强。中国对外援助数量上的骤增，形式上的多样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关注和影响，尤其是其与现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体制不一致的地方更是引发广泛热议。从根本上而言，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最早源起根植于西方早期殖民历史渊源之中就形成的西方与外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

系，是这种单向不对称关系在二战后的另一种体现。而与之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援助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样一种南北关系，以及基于这套关系之上的国际发展实践模式、指导原则、政策话语、治理架构、甚至评价标准等。目前，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进程、传统援助国与新兴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修订与合法性、以及发展资金来源及主体的多样性等都是国际发展界热议的话题，而对于这些话题的探讨无一不涉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实践、模式，中国在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观点，以及中国发展经验的价值、分享与可能的贡献等。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继2013年出版过的《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后又连续推出四本书，《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国际发展援助——非政府机构的发展援助》，以及一本非洲发展研究国家案例之坦桑尼亚，《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等，之后我们还有一系列基于实地调研材料之上的著作陆续出版。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著作的出版能够一方面推动理论界对于当前国际援助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及所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以便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理论研究与政策完善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能够配合我们中心所协调的国际发展研究网络建设等工作，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国际发展人才和智库。

在上述著作编著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各章的作者，互相分享资料，耐心修改书稿，并对本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马洁文，她不厌其烦地完善书稿的各个细节，没有她的贡献，书稿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工。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对于本套丛书的支持。完稿之时，遗憾之感而起，凡事不能完美，书中自有疏漏贻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5年1月23日

## 目 录

第一章	坦桑尼亚以农业促进增长与减贫 ——从中国农业发展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	1
第二章	坦桑尼亚的农业与发展.....	66
第三章	坦桑尼亚的工业与制造业发展研究.....	93
第四章	摆脱“资源诅咒”？ ——坦桑尼亚矿业与发展.....	115
第五章	坦桑尼亚的减贫历程及挑战.....	137
第六章	坦桑尼亚社会发展状况.....	157
第七章	国际社会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援助.....	177

# 第一章

## 坦桑尼亚以农业促进增长与减贫

——从中国农业发展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sup>①</sup>

李小云

**摘 要：**中国农业发展是该国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主要力量。农村地区的大面积减贫是20世纪80年代起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农村人口在贫困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从80年代的80%持续下降至2000年的55%。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向了其他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在中国，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亲贫式经济增长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达到了减贫的目的。坦桑尼亚国内气候多样，土地和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但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靠近东非的海岸与八个国家相邻，这样的地理位置很有战略意义，为其农业品进入地区及全球市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这些因素使得坦桑尼亚的农业部门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业出口量减少、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等因素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农业并未对政府的减贫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尽管中坦两国存在巨大差异，但在20世纪80年代

---

<sup>①</sup> 本文是坦桑尼亚和中国在农业发展及减贫方面交流项目的研究成果，出资机构为世界银行坦桑尼亚办公室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本报告由李小云教授在赵佳女士和于乐荣博士的协助下完成，原报告为英文，杨静翻译。



初，中国和坦桑尼亚均处于农业社会，农业在经济生活中都扮演了相似的角色。甚至，中国在土地所有制、农村财政和农业税收等方面均比不上坦桑尼亚的有利条件，但其农业却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中坦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同时开始市场改革的两个国家现在却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坦桑尼亚能否借鉴中国在农业发展以及减贫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本报告将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坦桑尼亚 减贫 农业

## Tanzania's agriculture-driven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up>①</sup>

Li Xiaoyun

**Abstrac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 large part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is a result of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since the 1980s. Between the 1980s and 2000, the proportion of the rural poor out of the total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declined from 80% to 55%. In this process,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witnessed rapid growth and capital flow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other sectors; Furthermor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

---

① This paper i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anzania and China's exchange program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funded by the World Bank Tanzania Offi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This report was prepared by Professor Li Xiaoyu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rs Zhao Jia and Dr. Yu Lerong. The original report is in English and it was translated by Yang Jing.

particular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ers for its sustained development.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based pro-poor economic growth created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achiev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simultaneously. Tanzania has diverse climates and is rich in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bu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The coast near East Africa borders eight countries, which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s very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enter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As a result, Tanzania's agricultural sector has an obvi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reduced agricultural export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however, hav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 has not made due contributions to achieving the government's poverty reduction goal. Although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anzania, in the early 1980s, China and Tanzania were both agrarian societies, henceforth agriculture played a similar role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land ownership, rural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taxes. However, in both cases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supported the growth of the entire economy and both countries start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is gave rise to a thought-provoking question - Why are the two countries that began market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in two totally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now? Can Tanzania learn from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is is the key question this paper will answer.

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的经济发展和快速减贫为全球所瞩目，对非洲国家和国际发展领域而言尤为如此。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均9%左右。按每人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Ravallion, 2007）来计算，贫困发生率从1984年的84%下降至2007年的5.4%（Ravallion,

2009)。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但农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在进入21世纪以后，农业仍然保持着最高的贫困—增长弹性，达到1.51%，而工业和服务业的贫困—增长弹性则分别为1.09%和0.73%（李小云，2010）。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约为4.4%，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7%，农民收入年增长率为7.1%，农业是中国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支柱。随着市场改革的进行，农村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向其他领域，同时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开始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超过80%下降至2000年的55%左右。以激励为基础、有利于市场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也带来了农村地区的大规模减贫。

沿着上述发展途径，农业领域的变革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从改革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单个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改革，粮食作物开始增产，缓解了粮食不安全状态。在此期间，国家提高了粮食定购价，并开始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粮食总产量从1977年的3.16亿吨猛增至1984年的4.073亿吨，同期人均粮食拥有量从290千克增至390千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实现多样化发展。农产品市场开始实行自由化，国家取消了对粮食市场的管制，消除了地区贸易壁垒，农业结构从以粮食作物为主导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牲畜多样化发展逐步转变。农业实现了持续增产，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此期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崭露头角，因此得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人口也出现下降趋势，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有所增加。农民收入不再局限于农业收入而开始有多种来源，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增加。

在以上两个阶段，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一次减贫。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至1990年的9.4%，大部分贫困人口都于20世纪80年代显著脱贫。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农业增长速度放缓，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增加。

前两个阶段的迅速减贫、城镇化和工业化继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和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农业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由于国家出台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支持，对农业的投入和各类补贴均有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对贫困发生率的持续下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其他非洲国家相同，坦桑尼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8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处于国民经济的中心位置。其气候适宜农业生产，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海上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八国接壤的条件均有利于坦桑尼亚的农产品进入地区和全球市场。这些都使该国拥有相对优势的农业生产条件。1995年至2003年间，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以上，2003年的GDP增长率达到5.8%（Gordon，2008）。坦桑尼亚的农业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坦桑尼亚政府已经认识到本国农业发展的潜力以及农业部门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的作用。该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业增长率分别为2.9%和2.1%，至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农业增长率已达3.6%，到2007年又升至3.9%，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3%的平均增长率（Gordon，2008）。1996年至2003年，坦桑尼亚农业年均增长率达4%。1998年至2008年，农业GDP以每年4.4%的速度增长。坦桑尼亚的平均粮食自给率达到102.5%，成为非洲粮食自给率最高的国家（坦桑尼亚农业、粮食安全与合作部，2008）。粮食生产者和园艺生产者已经更加深入地参与进了地区和全球性的市场，也因此而避免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产量波动（Gordon，2008）。以上这些成就应归功于坦桑尼亚政府为加快农业增长而实施的一系列结构和政策改革，使该国朝减贫的目标迈出了积极的步伐。

在后期的结构调整时期，坦桑尼亚政府已采取重要措施来发展本国农业。2001年的农业部门发展战略（ASDS）标志着政府的发展战略初步开始向农业和国内粮食安全倾斜。ASDS中的各项措施为农民提高产量提供了契机。2005年的农业部门发展规划（ASDP）则包括了经济增长和减贫（Mkukuta）整体战略、坦桑尼亚减贫战略和其他相关战略（如公共部门改革项目和分权项目）。ASDP的实施是通过发展乡村农业发展计划（被纳入区

域农业发展规划中)来实现的。

ASDP 的实施较先前其他活动更具组织性。从首相办公室、地区管理部门到地方政府和四大农业领导部门,均设立起了清晰的责任框架。在实施上述计划的同时,政府还引入了农场投入补贴规划、灌溉战略、机械化战略、种子生产和播种改良计划以及仓单体系。为了增强 ASDP 的执行效果,政府还实施了名为“Kilimo Kwanza (农业优先)”的新计划,在此同时加大政府干预,通过设立农业发展银行来增加私营企业的附加值。用于实施上述计划的支出占政府预算中的比例从2007—2008年的4.6%显著增加至2008—2009年的6.1%(坦桑尼亚农业、粮食安全与合作部,2008)。坦桑尼亚近些年设置的机构和金融框架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也展示了其执行农业发展战略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

然而,1980—1990年间,坦桑尼亚的人口增长率为3.3%,1990—2000年间为2.2%;而农业增长率为3.6%,净增长率仅为1.5%,因此,即使在合理的农业增长率下,农业人均增长率仍未达到强劲态势(URT,2006)。人口增长和技术落后对该国农业、环境和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坦桑尼亚人口密度仍较低——每平方公里26人——但其居民正朝农业边际土地扩散,已取得的成就并不足以显著改变人均收入和农村贫困的现状(Gordon,2008)。

该国农业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有待提高:

农业生产率水平仍然较低,农业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玉米种植面积的比重在上升,但其产值却呈现下降趋势。

农产品出口额有待提高。虽然由于激励制度的改善,农业出口增长速度可以与农业增长率的变化保持一致,但农产品的出口额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自20世纪80年代起,传统出口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从10%下降至7.4%,其市场份额一直停滞在5.5%左右;而同时非传统作物的出口额虽然达到全部农业出口额的40%左右,却又并未成为活跃部门(Binswanger-Mkhize 和 Gautam,2009);

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较低。坦桑尼亚劳动生产率至少需要达到

2.7%的年均增长率，才可赶超2.3%的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从而使农业年增长率达到5%（Gordon, 2008）。1990—2003年间，坦桑尼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1.1%，远低于其既定的目标。这主要是由生产力激励不足、恶劣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低效的国营投资决策等因素造成的，导致在现有产能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生产能力又被进一步扩充。因此，造成以下结果即农村非农部门增长缓慢；全国和农村的减贫现状并不理想。

激励欠缺、利润率低下、农民无力积累资本以及内向型的农业增长战略是导致坦桑尼亚农业表现不佳的原因（Binswanger-Mkhize 和 Gautam, 2009）。

坦桑尼亚政府、公众和援助国已就农业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脱节进行了充分讨论。过去10年中，坦桑尼亚农业发展遵循的路径与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似，为什么中国成功将农业发展和减贫挂钩，而坦桑尼亚却没有做到？因此，为使农业成为增长和减贫的首要驱动力，坦桑尼亚需认真审视其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以及公共及私营领域对农业的投入，学习他国经验教训，尤其是学习应如何将国家、市场以及公共、私营投资政策这几方面应发挥的作用结合到一起。

尽管中国和坦桑尼亚在人口数量、国家大小和国内市场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经济结构均以农村农业为主，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坦桑尼亚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乌贾马运动为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使得中坦两国甚至都拥有相似的政治体制，在文化氛围、基本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具有很多的相同点，更重要的是拥有长期的社会与政治稳定。此外，中国在土地使用权、农村金融和农业税收等方面的条件较坦桑尼亚还更为不利，但农业确实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农业的增长占整体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7%。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坦桑尼亚是否能够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坦桑尼亚能从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经历中学到什么。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曾面临过调整国家角色和加强市场作用这些问题，如今坦桑尼亚也即将迎来这样的挑战，我们当然要问，坦桑尼亚是否可获益于中国经验？

过去10年中，在非洲国家、国际发展组织和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非

之间的学习活动有了显著提升。但我们仍可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鉴于中非之间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该学习过程是否合适？

即使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也曾向西方、日本和新加坡取经，说明之前也存在这种互相学习的成功先例。那么非洲国家能够从中国真正学到什么？

中非之间的学习活动如何能够更为有效？

非洲国家能否承担和适应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学习发展过程？

非洲是否能够向中国展示其获得的经验教训？

因此，鉴于坦桑尼亚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及历史联系，我们以坦桑尼亚为例来进行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找准两国发展路径中的关键因素，从而实现发展经验的共享。我们将不通过实证方式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而是利用现有研究和有限的实地观察，通过描述性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本研究将采取全面的视角，重点对中国1978—1984年间情况与坦桑尼亚2001—2008年间情况进行对比，因为两国的快速发展分别开始于上述各时期。

## 1. 中国及坦桑尼亚农业发展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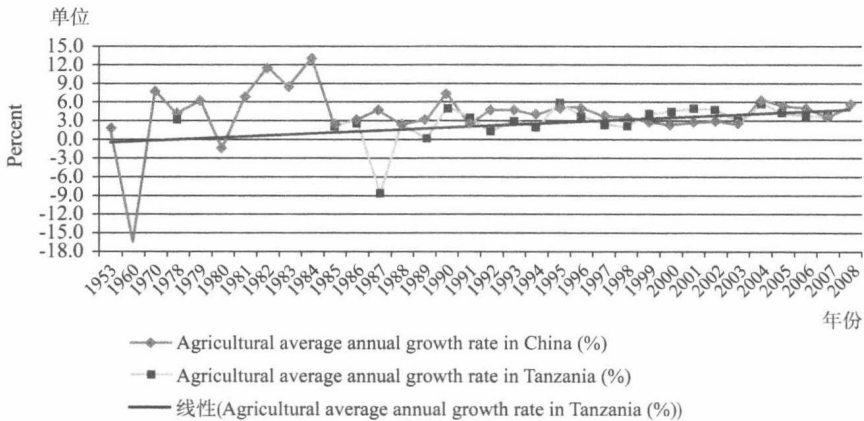
### 1.1 中坦农业发展概况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非农行业有了巨大发展，坦桑尼亚也在矿业、旅游业和服务业方面发展迅速，两国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都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中国和坦桑尼亚分别有超过60%和超过85%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因此，农业部门对两国的农村地区的减贫至关重要。农业依然在两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图1-1显示了过去几十年来两国农业GDP增长率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农业增长率仅为2%左右。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在1978—1984年间，中国迎来了农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6年间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2%。这一时期农业产出及产值的增长弥补了后期农业GDP增速下降和停滞带来的影响。2004年以后，中国农业发展更加迅猛，已经实现了5.2%的年均增长率。总体上看，过去30年里，中国农业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4.3%。



坦桑尼亚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5%，低于中国4.3%的水平，但是超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3%。1996—2003年期间，坦桑尼亚的农业GDP加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高于同时期中国农业GDP的增长率，但2004年以后增速放缓。根据《农业部门回顾报告》的数据，1998—2008年间，坦桑尼亚农业GDP年均增长率为4.4%（农业、粮食安全与合作部，2008）。

两国农业表现上的差异可以通过人均农业GDP来观察。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农业年均增长率并不存在显著差距（图1-1），但是从人均农业GDP看，如图1-2所示，中国农业的表现要好得多，显示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均农业GDP不足100美元（根据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而坦桑尼亚在同期超过了160美元（按照同样的标准计算）。中国人均农业GDP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200美元，而同期坦桑尼亚却降至130美元。虽然坦桑尼亚人均农业GDP在2000年以后开始回升，但是年均增长率只有1.4%，2000年为140美元左右，2007年达到160美元；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均农业GDP保持了3.3%的增速，从人均200美元上升到人均270美元。



Agricultural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China (%): 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 (%)

Agricultural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Tanzania (%): 坦桑尼亚农业年均增长率 (%)

图1-1 中国和坦桑尼亚农业GDP年均增长率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坦桑尼亚农业、粮食安全与合作部，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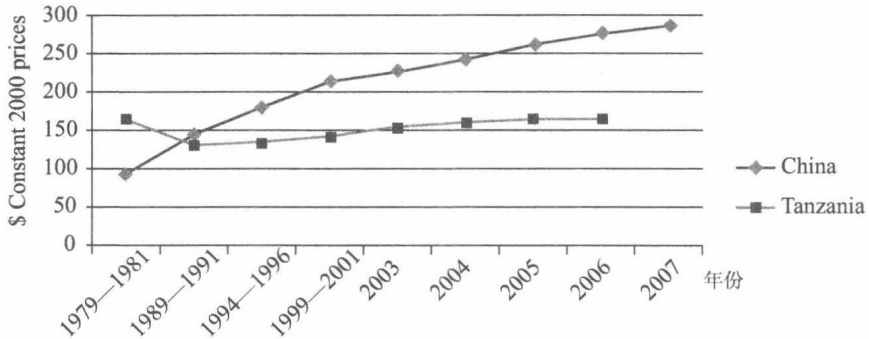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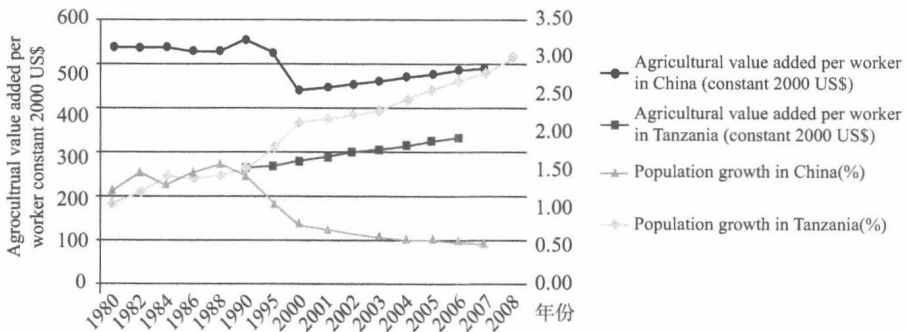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和坦桑尼亚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 GDP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中国人均农业 GDP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超过坦桑尼亚，人均农业 GDP 的高速增长反映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1990 年，两国以农业 GDP 测算的农业生产率处于相同水平，即单位劳动力农业 GDP 均为 264 美元左右；而到 2006 年，中国单位劳动力农业 GDP 增长到 461 美元，坦桑尼亚下降为 326 美元（图 1-3）。



Agricultural value added per worker (constant 2000 US\$): 单位劳动者的农业增加值 (2000 年美元不变价)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

agricultural value added per worker in China (constant 2000 US\$): 中国单位劳动者的农业增加值 (2000 年美元不变价)

agricultural value added per worker in Tanzania (constant 2000 US\$): 坦桑尼亚单位劳动